

受感的心銘

語所的人員和圖書資料業已全部遷到台灣，所以房屋空下來，使我們能够獲得舒適的臨時住所。

永遠記得這個日子

這時候傅孟真先生正預備接任台灣大學校長

銘心的感受

——恭聆國父訓示憶述

孫逸仙與新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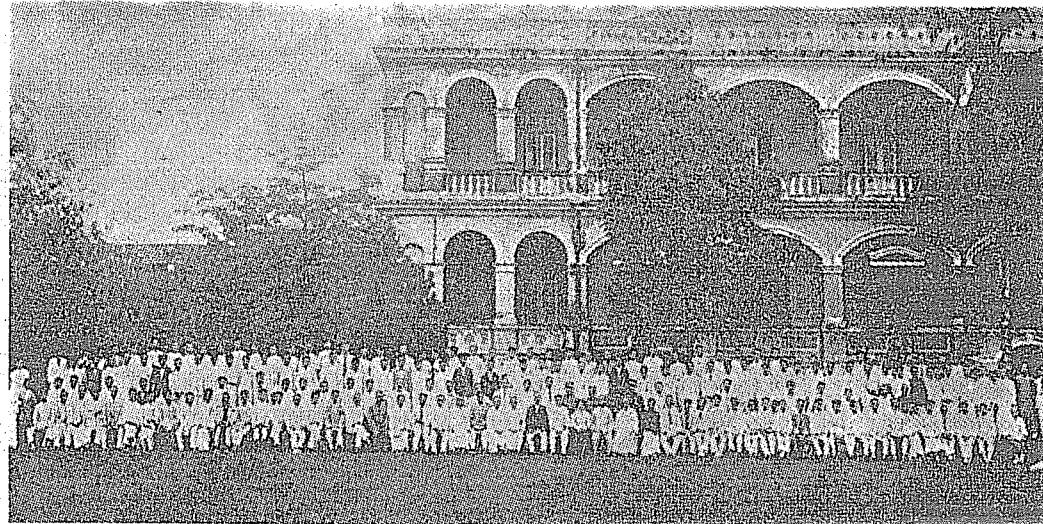
國父領導國民革命，畢生艱苦奮鬥，其可泣的事實，史不勝書；其盛德大業，豐功偉績，中外人士，同深崇敬。余生也晚，國父創立中華民國的時候，我還是一個九歲的小孩子，沒有機會直接追隨國父，參加革命行列，但在求學時期，倒有幸會三度親聆國父的訓誨。因此，我樂意應「中外雜誌」之邀，扼要憶述親聆國父訓誨的經過和感受，藉以對偉大崇高的革命導師，敬表衷誠的景仰。

我第一次謁見國父，是民國十二年在廣州大元帥府。當時因為廣東駐軍截留稅收，政府財源短絀，教育經費不能按時發放，積欠各校教職員薪金，各校教職員遂聯合罷教，學生甚為同情，便推派代表向大元帥府請願。我是國立廣東高級師範的學生代表，和其他學校代表一起到大元帥府去求見國父。執事人員領我們進入一個會議廳，大家圍坐在一個橢圓形的會議桌上。很快，國父便出來接見我們了。他穿着長袍，神采

奕奕，態度非常雍容慈祥，大家見了，都為他的氣度所感召，很自然的站起來向他致敬，每一個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後來我聽吳稚暉先生在中央訓練團講「國父行誼」，說到他和國父首次見面的經過：在未見面前，以為國父不外是一個草澤英雄，後來聽鈕錫生先生說：「他是一位溫文儒雅、氣宇偉大的紳士」，直到在倫敦見面時，使他覺得：「國父祇是偉大，不能形容的偉大，稱為自然偉大，最為適當。」于右任先生記述他初謁國父的情形：「孔子稱老子『猶龍』，虬髯公稱唐太宗為『天人之資』，皆無以狀其偉大也。」我自己回憶當年印象也深具同感。

記得國父入座以後，便招呼我們坐下，當時我是坐在他的右邊。他很和藹親切的要大家逐個陳述意見，大家都慷慨激動地要求政府立即清發教育經費，使教員復教，學校復課。國父很耐心的等代表們一一講完後，才很懇切的答復大家說：「大家的意願，我很明白，你們重視學業的精神，值得嘉許，但是大家要知道：政府為什麼發不出教職員薪金呢？這完全是因为一般不識大體的軍人，自私自利，破壞政府稅收制度，截留國家稅款。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為着要使國家富強康樂，為達到此目的，必須剷除障礙，克服當前的一切困難。如果你們的教職員一時仍不願復課，你們應該忍受一時小小的損失，以求取長久的幸福。希望你們利用這一停課的時機，到社會上去參加革命宣傳，使一切軍人，深明大義，服從政府命令，把稅款交還政府，以作教育和建設的經費來解決大家的問題；同時，多方號召民眾幫助革命。大家千萬不可浪費時間，希望好好向各校教職員和同學說明這些道理。」國父這一段話，說得非常坦誠懇切，使大家聽了都很自然的心悅誠服，回校公開廣為宣佈，結果大家一致表示支持政府，請求老師們立即復課。

國父的老師康德黎先生在他和詹斯合著的「孫逸仙與新中國」（一九一三年出版）一書中曾



國父偕夫人於中華民國學聯會大議評會出席日

影合代表全體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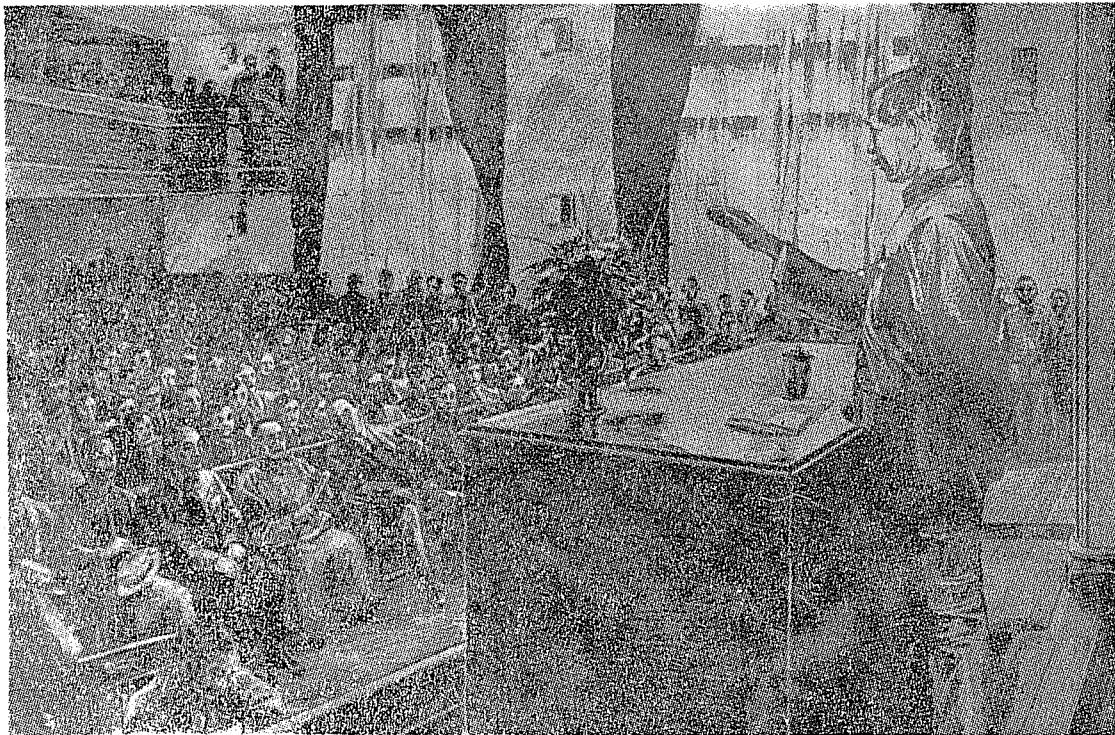
說「他是一位天生富有感召力的人，不論在手術臺或沙場上，能令人心甘情願地隨時準備替他效勞。他有一種不可解釋的潛勢力，一種不可抗拒的感召力，吸引人們與他同道。」

回憶第一次親聆國父言論的情景，確有同一的感受。同時，我覺得國父的氣度和他的感召力和吸引力，是來自他偉大崇高的人格，正如菲律賓獨立志士彭西在所著「孫逸仙——中華民國的創建者」一書中所記述「他偉大人格的本質，是謙遜、平易、質樸……他不偏激，用和藹親切的态度，闡揚他的思想，同時，以最善意的心情，和顏悅色地答復反對者的質詢。」吳稚暉先生也說：「總理一生，苦口婆心，見人即滔滔不絕地指示他的主義，然而只樸實的抒其所見，絕不肯用手段，見一人說一樣話。」所以，他對學生們也一樣的耐心聽取意見和坦誠的闡明革命的理想和當前的困難。無時無刻不以實現主義完成革命為念，也隨時隨地爭取羣衆對主義的信仰，態度又是那樣誠懇自然，難怪凡和他見面的人都為他所感召而自然心悅誠服。

第二次恭聆國父訓話是民國十二年十月，全國學生聯合會評議部在廣州舉行全國學生評議會，我當時是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生會的評議部部長，便以當然出席全國學聯評議會的資格，參加會議。當時

全國學聯會的立場，並不完全支持廣州的革命政府，所以會場還是掛五色旗和唱「卿雲歌」。來自全國各省的代表思想更不一致。會中言論還很紛歧。但國父到會致詞時，他的慈祥仁謹的風采，便立刻受到全場的尊敬。他的訓話更完全是

以教育家的立場，向學生多方譬解和開導，充分表現了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的風範。他首先鼓勵學生要以國事為己任，他說：「學生是讀書明理的人，是指導社會的，若不能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而苟且從俗，隨波逐流，那就無貴乎有學生了。」然後要大家研究學問，明白事理，他指出民國以來的亂源都是革命尚未成功之過，要大家贊成革命，實現三民主義。接着，他坦白的指出以「五色旗」為國旗，以「卿雲歌」為國歌的錯誤，也分析了大會言論和宣言的觀點，認為不完全正確。他更舉出辛亥武昌起義的事實，對大家說：「當時革命黨幹部被捉去卅餘人，所有黨籍冊子都被搜去，砲兵營工程營的士兵列名黨籍的很多，大家悄悄的商議，與其明天被捉去殺頭，不如我們先下手拼個死活，但是有砲無步槍是不中用的，步槍的子彈又已被收繳，這怎麼辦呢？幸而有一位熊秉坤，他的朋友剛退伍，手上還有二盒子彈共二百顆，一齊借來，每人發三四顆，便藉以發難，以後推大砲進城攻總督府，將瑞徵嚇跑了，但是當時本城幹部既遭難，上海幹部又未到，要找領袖人物才好，」便把黎元洪從床下拉出來，用手槍逼迫，要他做都督。從這故事可以說明祇要有決心，有勇氣，有辦法，革命必成的道理。他又說了一個龍濟光的故事，



國父民一年三十月十二日在廣東高級師範學院校三演講之義情。

「說他做廣東將軍的時候，從香港來了一個外國人，說要拜會他，龍氏趕忙帶同翻譯，招待這一位外國人到客廳，設盛饌相待。鬧了半天，翻譯問他有什麼事要同將軍商量？他囁嚅道：我來想替將軍量製衣服，我是裁縫。」國父用這些笑話說明軍閥崇洋的可笑和自立自強的道理。這講詞的紀錄，後來以「學生要努力宣傳，擔當革命的重任」為題，列入國父全集。

國父這一次對我們講話，自始至終都充滿了教育性和啟發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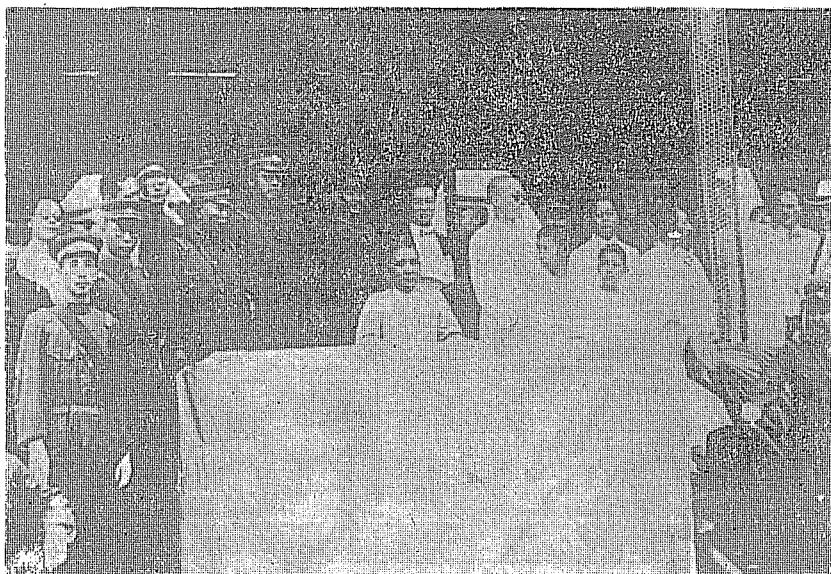
所以，大家都聽得津津有味，深受感動，尤其是國父那慈藹親切的態度，明晰溫和的聲調和生動有趣的詞句，吸引了每個人的注意，也深入了每個人的心坎，大家都深切感受到一份師長的關愛，所以，全場曾一再報以熱烈掌聲，而在演講後，大會立場便趨堅定，支持革命，並且

成了王道的力量。

國父對青年學生有這樣大的感化力還是由於他的偉大人格和他對青年的自然的關切和愛護，他認為青年是革命的先鋒和主力，也把青年視作他的子弟一樣，所以他對青年很自然的表現他的慈愛。而這仁慈博愛就是他人格的基本，他畢生致力革命，便是由於他對國家、社會和人類的愛心。戴季陶先生說：

「國父的人格以仁愛為基本，一切表現無不以為仁愛，有過人之智，而其智要以知仁，有過人之勇，而其勇惟用於行仁，可知離開仁愛，絕無革命可言。」先總統蔣公也說：「總理一生的人格和精神，完全以仁愛為基本，無論待人接物，莫不充分表現仁慈博愛的精神。因此，總理有過人的智勇，惟用之於救國救民的。」這一份仁愛的光輝，便是他感人的能源。

最後，我恭聆國父演講三民主義是由民國十三年一月開始。正如大家所知道：三民主義是國父的革命思想，他自撰述孫文學說（心理建設）、實業計畫（物質建設）、民權初步（社會建設）各書以後，便從事三民主義的著作，但未完成就毀於陳炯明叛變之役，因此，他在完成中國國民黨改組後，便在我的母校——廣東高師範禮堂開始演講三民主義，以備將之整理出版作為三民主義宣傳的課本。我在前一年剛由鄉校長海濱先生介紹入黨，聽說國父來校演講三民主義，自然不願放棄這大好機會，而當時聽講者除了黨國先進、軍政首長和黨的幹部外，也歡迎廣東高師和專上各校學生去聽講，因此我便自然



國父回粵就任大元帥後民國十二年三月二日在廣州東校場檢閱軍隊時之情形。

成為基本聽眾之一。國父由一月廿七日起，每週一次，在星期日來校講演，很少間斷，到四月廿七日，計講了民族主義六講、民權主義六講，國父因眼疾，須加調治，同時，他認為「民生主義的理論，比民族、民權兩主義都深奧……要」。

充分時間去準備一下，」所以停講了三個多月，把民生主義講演的大綱擬好後，再從八月三日起開始講民生主義，但只講了四講，便因北上中止。當時，國父應邀於十一月十三日由廣州啓程北上，原擬到北京後繼續講演。據黃昌穀先生所記述，國父「沿途無論是遇任何風波勞動，仍閱讀有關民生主義的參考書，滿擬到京後稍息，即繼續從事講演」，邵元冲先生也說：「國父講了民生主義第四講後，就有平津之行，預期在北京大學完成民生主義各講，故搞參考書頗富，於舟經日本時，更增購新書盈篋；既抵京，臥病行館，猶於枕上披覽不輟，余諦視之，則討論居宅之書也。但不幸國父抵京後即染病不起，致三民主義的講演，未能完成，這實在是國民革命的一大損失。而未完成的講演，據一般說法，依民族民權兩主義的前例，應還有兩講，是講「住」和「行」的問題，但據黃昌穀先生記述，國父所說，實際上則還有四講，除「住」「行」兩講外，還有一講是民生主義總論、一講是三民主義總論。先總統 蔣公認爲國父對「住」「行」雖未作有系統的說明，和「樂」也很重要，國父對此作文字上之說明不多，特親撰「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三民主義的全部講演才算完成。

都坐滿聽眾，很多時候還四周都站滿了人，國父每次到校講演，禮堂的樓上樓下，

但國父到場後，便都很自然的安靜無聲聽他演講。他演講時，態度從容，聲調鏗鏘，自始至終，侃侃而談，大家都聽得很入神，沒有人中途退席，尤其是我們做學生的。國父每次演講完畢，大都是用膳的時間，有時演講未完，飯堂已搖鈴開飯，大家還繼續聽講，寧願聽完後才去吃冷飯剩菜，也不顧中途退席，可見國父講演的吸引力，尤其重要的是國父的說服力。老實說，當時中國國民黨雖已倡導三民主義多年，但大家對主義的認識都不太普遍與深入，尤其對於其中的奧理精義。聽了國父的講演後，大家都有豁然貫通，恍然大悟的感覺。這固然是由於國父的運詞顯豁，條理明晰，而且取材適切，深入淺出，更重要的是國父瞭解聽眾的心理能用最簡明的話來說明最深奧的義理，和他的學問淵博，而且能融會貫通，故能採用古今中外的學說和各種具體事物與科學技術，來印證自己的理論。這樣自易使人衷心感佩而信仰力行。

國父演講時，所用名詞都很簡單明瞭，而却能很適切的表達其中奧義，好像他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民生主義就是發財主義」、「政治就是管理衆人的事」，都很淺白易明，而其中道理却很深奧。他對於措詞用語非常審慎，演講後筆記的校閱，訂正和印行，也非常認真。好像「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這一句話，海濱先生校閱時，覺得太簡單，想加一段話來說明，國父看了以後，認爲意思雖然不錯，文字却不够簡明，便親筆改爲「何以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呢？」因爲三民主義係促進中國之國際地位平

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又有一次，海濱先生覺得民族主義中有一段話，不大明白，便去問國父。國父問明是那一段後，便將全段刪去。他說：「三民主義的學理雖然深奧，却要使凡識字的人，個個都能看得懂。你是大學校長，如果都看不懂，便要全部刪去。」他能隨時注意對方能否接受，他的說話和文字自必富有說服力，難怪許多人都說，國父是天生的教育家。

至於國父學問的淵博，大家都已知道。他好學不倦，先總統蔣公便曾說：「國父一生只要一日不看書，即皇皇如有所失」。奔走革命期間，無論到什麼地方，他都帶着許多書本。在倫敦時，有一位革命同志曹亞伯，見國父連旅館的房租都幾乎付不出來，便湊了四十英鎊給他作費用，國父見他一片至誠，便接受了。但第二天，國父便將這些錢拿去買一大堆書回來，曹同志見了，非常吃驚。還有國父對各種科學，都涉獵研究，在香港讀醫科時，便熟讀廿四史，同學起初以為他只是拿來裝飾，有一位同學何允文便故意去考問國父，他都答對如流，同學都加敬服。國父不但博覽羣書，而且能融會貫通，更加以闡發，以創造自己的學說，組成革命的思想體系。邵元沖先生曾問國父研究的是那一種學問？他說：「我所研究的是革命的學術，凡一切學術，只要可以有助於我革命的知識和能力的，我都拿來做研究的原料，而組成我的革命學。」馬林曾問國父革命的基礎是什麼？他說：「中國有一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承此

道統，而加以發揚光大。」由此可見國父的革命思想是以他博大精深的學問為基礎而自成體系的。他的演講，自然富於說服力。

國父的革命思想固以三民主義為中心，但他自述他的著述體系分「心理」、「物質」、「社會」、「國家」四項建設，三民主義為國家建設之一部分，此外，尚有五權憲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國防計畫各冊，可見國父不但有其革命理想和目標，更有實現其理想的具體規劃和方案，而三民主義的目的，不僅在「以

道統，而加以發揚光大。」而國父所倡導的三民主義，今已成為世界思想的主流，正如先總統蔣公所說：「三民主義不獨是今天二十世紀的主流，而更加是這個黑暗昏亂世界的指南車；是一切被役的國家和人民自拔於共產邪惡的聖火明燈。」所以，國父不但是我們思想的導師，也是世界人類思想的先知。

吳敬恒的滑稽詩

周定微

吳敬恒幼名紀靈，亦稱寄船，字稚暉，晚號朏盦，他作的詩是從來不發表的，隨寫隨燒，不肯示人，但是筆者却存有吳氏絕無僅有的

一首詩，突梯滑稽，令人笑痛肚皮，茲將原詩及序文錄後：

(序文)夜半四時許，瀉藥之性發，急急開燈，披棉袍已來不及，不知能走到毛廁矣，即扯着棉袍角，在床前放手一撒，自然一地一天星，臭氣薰騰，糞花四濺，又走毛廁，撒個暢快，洗淨臀部，進房收拾，然並未喊老媽子送爐灰一糞箕，也並未喊小當差拿巨大拖糞帚做工，止化了面盆一

隻，刮墨刀兩巴，揩布一塊，至五時半個鐘頭半截腰，居然遮蓋絕對好。不是親眼看見過，不信有此不得了。

無錫常言稱老小，人一到老就會小。吳敬恒寫這首詩，完全是他說過的「放屁！真正豈有此理」的作風，嬉笑怒罵，都成文章。他早年鴻迷信共產主義的一些左傾分子，曾經這樣譬喻說：

「他們這般雜種，咬着了斯太林的雞巴，連雞腿都換不下來」，這種說法，真是痛快之至。